

一部农业地理的长卷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评介

李宝田¹, 李 丞²,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中国自古即以农业立国, 农业生产不但是历史时期最重要的经济活动, 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环境变化。因此历史农业地理不但是历史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环境变迁研究的基础。北京大学韩茂莉教授积十年之功写就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一书, 堪称是历史农业地理的创新和集大成之作。该书以128万字的篇幅, 系统展示了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的全景, 同时又在很多关键性的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解决了历史农业地理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打破时间和地域的界限, 对中国历史农业地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释, 并就中国农业空间的拓展进程, 水利与主要农耕区的开发, 农业生产技术的地域差异与农业环境利用, 旱地杂粮、小麦、水稻、玉米、甘薯、主要经济作物以及蔬菜等作物的种植制度、空间分布以及传播路径, 畜牧业的产生及其空间分布, 各农业区的发展进程等农业地理问题展开全面论述与深入探讨。

农业立足于大地之上, 与地理环境、人类活动形成有机的互动关系。著作中对冬小麦南迁的研究, 即鲜明的体现了这一点。北人多次南迁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现象, 在北人南迁的过程中, 大量的物质、文化、技术等元素被带至南方, 并受南方环境的影响出现继承与嬗变, 进而完全融入南方社会, 推动南方经济的不断进步。冬小麦也是在历次北人南迁的过程中传入南方的。南方开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每次冬小麦传播带来的效果亦有区别。《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对于每一次冬小麦南传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如东晋南朝时期的北人南迁主要迁至江淮一带, 而在这一部分南迁人群完成土著化之后, 冬小麦南传的过程就基本停止了。迁入北人的后代融入了当地社会, 成为了擅长种植水稻的南方农民。作者站在移民的角度, 以移民土著化为重要线索, 发掘冬小麦在南方的传播过程及其特点。而以一视点来审视作物的传播过程以及传播过程与人口流动的相互关系, 对于探求中国古代各类农作物的时空分布及其变化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历史上三次北人南迁, 虽然基本的路径大体相同, 但以此引发的冬小麦的传播方式却存在区别。作者之前曾对江南地区的稻麦轮作制进行过仔细研究, 在《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中进一步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确定稻麦轮作制是冬小麦在南方平原地带传播的重要途径的同时, 提出与冬小麦进行一年两熟轮作的只能是晚稻。晚稻为粳稻, 相对于籼稻, 粳稻对生长条件的要求很高。宋代是稻麦轮作制初行的时期, 粳稻只能在太湖平原与淮南地区种植。而淮南地区受热量限制, 不具备实行一年两熟制的基础。因此可得结论, 即宋代稻麦轮作一年两熟制的分区地带为太湖平原及其毗邻地区。对稻麦轮作一年两熟制最初实行区域的认定, 成为解读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基础。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就人口迁移对农业地理的影响, 进行了深入论述, 并指出人口南、北迁移带来农耕地扩展结果的同时, 加速了农作物品种之间的传播、嬗替以及新的农业种植制度出现。无论人口迁向何地, 迁入地与迁出地必然有着并不相同的自然环境, 向南、向北迁移意味着农作物不断突破原有的纬度界限, 农作物向西扩展则导致经度界限的变化, 此外伴随作物种植高程提升, 也改变了农作物垂直界限。三类界限中纬度界限包含着热量因素, 农作物北上意味着耐寒品种的产生, 农作物南下则与喜温作物相关; 经度界限受降水量制约, 中国自东向西表现出干旱程度逐渐加强的趋势; 高度界限涉及到水热双重因子的变化, 仅就温度而言海拔高度每提升100米, 气温下降摄氏0.6度。在人口迁移与农耕地扩展中, 三类界限中纬度界限的变化最大, 为了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 农作物种类与农业种植制度的改变是最普遍的应对措施。源于中国本土的农作物主要为北方谷子、南方水稻, 经过数千年的农业生产

活动,农作物种类不断丰富,仅从粮食作物种类来看,早已不限于谷子、水稻两大类型,外来作物的传入逐渐淡化了本土作物的地位,并通过作物嬗替、取代,建立了新的作物组合形式,从而改变了农业地理的基本格局。冬小麦是传入中国最早的外来作物之一,其进入中国的初始路径为自西向东,以后完成在各地的传播则以南北向为主。继冬小麦之后传入的农作物如占城稻、高粱、玉米、甘薯、马铃薯等,登录地点多为南方,主要传播路径仍为南北向。这些外来作物不仅具备高产的优势,更重要之处在于它们在新扩展农耕区内表现出良好的环境适应性,凭借环境适应性,这些作物不仅在北上南下中不断突破原来的农作物耕作纬度界限,而且对于原有作物存在明显的嬗替取代现象,无论史前时期传入中国的冬小麦,还是元代通过二次传入的高粱,以及明代传入的玉米、甘薯,主要取代了本土作物粟(即谷子)、黍的种植空间,并随着外来作物逐次传入,粟、黍从最初一统旱地农业的局面,逐渐降低地位,时至20世纪初即使黄河流域粟在耕地中也仅占30~40%的比例。作物间的嬗替是农作物与自然环境间的优选过程,正是这一过程的存在有效地推动了农耕区扩展与农业土地利用的深化。

水旱轮作体系的出现,成为中国南北方两大经济区联为一体的纽带,《中国历史农业地理》指出冬小麦等旱地作物的南传仅是南北两大农耕区融为一体的开端,水旱轮作制才真正将旱地作物融入南方核心农业区。水旱轮作体系出现在宋代,这一体系出现之前,旱地和水田是两种独立的耕作系统,两大系统不但有着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基础,各自采取的农耕技艺也迥然不同。水旱轮作通过耕作技术的革新,将水、旱两种完全不同的作物融入同一块土地。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水旱轮作体系使中国从空间上形成了南中有北、北中有南的多样化的作物分布格局与轮作体系,这一体系成为宋以后中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农作物组合中最活跃的部分。水旱轮作体系形成之初内部构成为稻麦两种作物,随着经济发展以及新作物的不断传入,冬小麦以外的旱地作物纷纷加入到水旱轮作体系之中,不仅丰富了水旱轮作体系中的作物构成,而且使轮作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更新,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从稻麦轮作到水稻与多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轮作。旱地作物南传与水旱轮作耕作体系为中国古代农耕区的空间扩展打下了技术基础,进一步强化了南北之间的文化交融与区域关联,对于巩固中国的稳定与统一,亦具有重大意义。

就广义的农业而言,畜牧业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畜牧业所处的区域与农耕区域存在空间上的相异,畜牧与农耕有着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再加上迥异的民风等因素,导致了历史时期对畜牧区以及游牧方式的文献记载十分匮乏,加之学界对于这一领域关注不多,影响了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作者依托对历史时期契丹、女真等民族经济生活方式的研究基础,发掘了包括西方人旅行记与满铁调查资料在内的各类草原社会调查,充分论证了草原游牧的有关内容,尤其是对于游牧方式和游牧空间两个重要问题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在对游牧方式——逐水草而居的论述中,作者全面探讨了划定季节牧场、季节牧场范围、游牧路线、营盘的环境选择、季节营地内放牧顺序和放牧方法、放牧与畜群等问题。在对游牧空间——各有分地的论述中,作者认为逐水草而居虽然是草原民族的基本游牧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游牧区域具有绝对随意性。草原固然不属于任何人所有,但各地区的牧场却大体划分区域,成为固定的部族或部落放牧场所,草原民族的季节迁移、转换营地基本限定于划定的区域内进行,越过界线到其他部落牧场内放牧的现象虽然在草原上不是新鲜事,但以—个区域为基本核心构成游牧空间,却是草原上通行的习惯。就时期而言,清以前各草原民族部落间的“分地”虽也以山地、河流、沼泽等作为界限,区分彼此,但“分地”与“分地”之间的界线始终不是绝对的。进入清朝,传统的不明确的“分地”边界变得严密而明确。

农业生产立足于环境之中,因此农业生产自身的变化往往成为环境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中国历史农业地理》涉及到的农作物种植制度与作物自身分布界限,文中对于这些问题的论证,不仅揭示了农作物之间以及农作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且对于研究环境问题具有重要参照价值。至于农业开发区的空间进程,更是认识人地关系变化的基础。农业生产系之民生,在中国古代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农业本身又融合了天、地、人三大要素为一体,《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就农业生产构建的地理问题作出的研究,为历史地理学作出一项重要贡献,这项研究带来的学术影响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突出。